

当我们唱响国歌

葛水平

昆明甬道街72号,成春堂中药铺,音乐奇才聂耳出生在这里。

这是一座昆明旧时常见的小院,正中三间二层楼房是经过修缮的“三坊一照壁”住宅,中间挂着一匾“聂耳故居”。说是故居,其实是院子的一半。为了讨生活租赁来开一家中药铺子,楼上一间屋子有一张旧式木床,上面标注说明:1912年2月15日(农历腊月二十八日)早晨,聂耳诞生在这张床上。

洒着缺少手温的寂寞,一张旧时代木床孤寂着,满是岁月风尘。一位出生仅活了23年的青年,他帅气英俊的模样定格在墙壁上,真是要感谢照相技术,它让一个人独自活下来,让后来者的记忆回到发生前的那个“当时”,逼你在照片前停留良久。

聂耳的父亲聂鸿义是玉溪有名的中医。1902年秋天,父亲聂鸿义和母亲彭寂庵夫妇俩背井离乡到省城昆明谋生,租下这幢小楼挂牌“成春堂”悬壶行医。父亲为聂耳取名守信,字子义。他有三个哥哥、两个姐姐,四岁时丧父,母亲是云南玉溪峨山县的傣族妇女,善良好学,且懂医药。中药铺子是全家人的口粮,母亲继

小时候我们家养过鸭子。鸭子非常聪明,深谙生存之道。野鸭飞行时会形成整齐的队列,而家鸭在放牧时也能成群结队行动。一只鸭子离群,会高声鸣叫,直到听到同伴回应并归队。若是发现丰富的食物源,它会发出“嘎嘎”的叫声,召唤同伴们前来分享。还会互相警戒,遇到危险立即发出警报,提醒同伴逃离。我那时就观察到,那五只鸭子在稻田觅食时,总有一只充当“哨兵”,警觉地抬头四处张望,其他四只则专注于寻食嬉戏。而“哨兵”是不断轮换的,便不存在饿肚子的问题。

母亲最疼爱它们了,鸭子傍晚归来,母亲担心没吃饱,总要给加餐。后来添了鸭宝宝,不知怎的一只腿受了伤,母亲找兽医治好了,却落下残疾,成了瘸子,走起路来左摇右晃,就像个醉汉。母亲唤“甲甲”,可怜它,给吃偏碗子。甲甲腿脚不灵便,抢不到食物,母亲就等其他鸭宝宝玩水时,单独为它准备些螺蛳、蝌蚪啥的。她走到池塘边,轻轻召唤:“甲甲,快过来呀……”说着把食物撒在水面,甲

近些年,宝山罗店镇开发了“古镇一条街”,有朋友知道我老家就在罗店,向我打听。我说,啊,这条长街叫亭前街,我最惬意的童年时光就是在亭前街上度过的,因为我的外婆家在那里。罗店镇在明清时期因为棉花产业而兴盛,直到三四十年前,依然是宝山北部地区最热闹的地方。亭前街处于镇中心的位置,生活百货一应俱全。两年前,上海新闻综合频道《寻味》栏目走访罗店古镇,本地文旅邀请我与拍摄,我意外发现亭前街上的“罗店供销社”依然存在,大超市里买不到的物件——热水瓶塞子啊,以前夏天人手一把的手工蒲扇啊,小时候父母从食堂带饭用的金属饭盒啊,都堆放在老式货架上,怀旧风扑面而来,让人欣喜又怅然。有的店铺是“常青树”,有的却已经消失了。幼年时,外婆家斜对面是一家点心店,下午三四点钟,外曾祖母会从贴身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包,层层打开,取出零钱,让我去对面买点吃。肉馒头热气腾腾,条头糕、麻球码在搪

继续经营药铺养育子女,维持着全家人的生活。一年的生意并不景气,悲凉后面是普通人中药一样的苦涩人生。云南是多民族融合聚集地,少数民族靠唱歌跳舞去沟通想法、表达情感。聂守信幼年受家乡民间音乐、滇戏、花灯等歌舞熏陶,爱上了音乐。十岁时跟一个木匠学吹笛子、拉二胡,又学会弹三弦和月琴,是小学学生音乐团的骨干。入中学后他学小提琴和钢琴,经常到风景如画的昆明西山美人峰、翠湖练琴,萌发了想当一名音乐家的愿望。他积极参加读书会、戏剧研究会及游艺晚会的活动,在这些活动中吹奏乐器,还饰演过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中的女主角。在简朴的日常生活中活着,因为音乐,一种有意义或者更有意义的生活开始了。

对于人类而言,当那些被社会同化或异化的人充斥在天地各个角落,受尽苦难,某些智者的孤独和思索便从这样的人群中诞生。在灵魂的漩涡中煎

熬过的聂守信,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,以探寻日常生活的意义为原点,将自己的心灵无限地向四周的生存意义拓展,他有一份对社会最终超越这种生活路径的雄心。音乐是他的路经,他用音乐爱恋这个世界,点燃光明,洋溢着快乐,而且把这些都激情化,这其中他舍弃了狭隘,舍弃了私欲,他甚至为了梦想来临的世界不谈恋爱。

但,并不等于他没有爱。因为爱,聂守信在昆明一师求学时,发起成立“七一一青年救济团”,受到当局

那是一张存储友人照片的时代,送自己的照片是珍存友谊的开始。当时联华电影厂女演员陈倩送给聂守信的照片,题词是:“耳耳耳先生留念。”黎丽丽送给他的照片题词也是:“给耳。”演员蔡楚生赠送的照片题词“四耳存。”有一张聂守信在飞机上的工作照片,他和另一个人的后脑勺,四只耳朵显著进入视线。那是音乐流动的时刻,他被

甲摇摇摆摆地游过来,开心地享用。母亲蹲着看,有时还伸出手,轻轻抚摸那光滑如缎面的羽毛。

鸭子生蛋很勤,鸭蛋个头大,颜色鲜净,很抢手。隔不到几天,母亲就拿到街上卖钱,再买回油盐酱醋什么的。鸭子也是劳动帮手,吃完稻田的水草,帮我们干了活;拉下的粪便肥了田,省了肥料钱,秧苗长得更旺盛。

唯一带给我们烦恼的是它们太恋家了,姑姑家在我们下边坝子上。于是,它们逮着机会就往下边坝子飞,像鹰一样滑翔,姿势飘逸优雅。可害苦了我们,没日没夜地找寻,不晓得跌了多少跤,划破了多少次手,磕伤了多少次腿。母亲从姑姑那里领了诀窍,把它们翅膀上的毛剪掉,果然飞不动了。往后只要生一点,就慌忙剪掉。鸭子很失望,夕阳时分,望着它们老家方向“嘎嘎嘎”大叫。后来绝了望,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

不觉来城里三十多年了,母亲也早不养鸭了,可那响过童年的“嘎嘎”声却时时萦绕在耳边,萦绕在梦里。

瓷大方盘上,盖着白色棉布,生煎刚出锅,是全发酵面皮的传统口味,没有汤汁,吃口格外饱满扎实。

亭前街以前有家文具店,兼卖一些彩色小皮球、铁皮青蛙、洋泡泡之类的玩具,是孩子们的“圣殿”。平日里,洋泡泡是充空气的,逢年过节,店里会有氦气球售卖。洋泡泡充了氦气,就不再是普通的洋泡泡,它们轻盈地飞了起来,头顶着店堂天花板,扎紧吹气口的棉线自然地垂下。有小朋友看中哪一只,店员一拽棉线,那只氦气球就落下来,棉线交到小朋友手里。

书店是所有店铺中最齐整、最美好的存在。各种面料分门别类地摆放,呢子归呢子,绸缎归绸缎,棉布归棉布,都层层卷裹在一块长木板上,竖着排列在货架上。看中了哪块面料,和营业员说一声,取下来,再仔细分辨图案,用手搓揉面料,看厚薄,易不易皱。选定了面

爱称为“四耳先生”,他有多双音乐的耳朵,他的耳朵拨开了弥散在人世间的迷障。

因为一双灵敏感知音乐的耳朵,聂守信改名聂耳。

在上海,他秘密参加了上海虹口区反帝大同盟,考入联华音乐歌舞学校为练习生的岁月中,在首席提琴手王人艺的帮助下,跟随意大利籍小提琴教师帕杜施卡学习。他勤奋学艺,一年后即由练习生升为正式琴师。

1931年九一八事变,1932年一·二八事变,聂耳亲眼看到日本强盗对中国的野蛮侵略,他决心以音乐为武器,投入对日寇的抵抗斗争中去。在抗日文艺宣传中,他认识了田汉,得到了教诲和指导,直接参加了左翼戏剧演出活动。

1935年,聂耳为电影《新女性》谱写主题歌《新女性》(孙师毅词),为电影《逃亡》创作了《塞外村女》《自卫歌》两首插曲。他为电影《风云儿女》创作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和《铁蹄下的歌女》(田汉词)在民众中引起轰动。

一首歌唱出了人世间的反抗,是奋起的反击,是为了寻找和平与高尚。激情迸发,是革命的激情成就了这首歌。一首歌,从宏观的角度来讲,在和平时期,则起着缓和社会矛盾、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与意义;在社会变革时期与非常时期里,它的作用与意义更加巨大。一首歌曲的威力甚至比一干门大炮的威力都大。

为了到苏联、欧洲学习,1935年4月15日,聂耳乘日本轮船“长崎丸”号赴日本转道。4月18日到达东京。不幸的是7月17日下午,聂耳与友人到藤泽市鹤沼海滨游泳时,被汹涌的海涛夺去了他年轻宝贵的生命,时年23岁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中国是受害最久、牺牲最惨烈的国家,同时也是一个反抗最猛、最为刚强的民族。战火中独有的真善美、战云中最灼目的电闪,其建构理所当然地含有杰出的音乐人。如果我

料,营业员用剪刀裁下顾客需要的尺幅。我喜欢听专用的大剪刀破开面料时的声响,嚓嚓嚓,碰上手势熟练的资深营业员,剪刀一顺到底,刺啦一声,一气呵成。收银员坐在店堂一角的高台上,是整个布店最酷的人,店铺的天花板上横七竖八架着铁丝,买完面料需要付钱开票,营业员写好单据用大夹子夹着,挂上铁丝,用力一推,夹子喇地飞到高台上,收银员核对开票,再用大夹子夹住找零飞回柜台。生意好的时候,店堂里喇喇声不断,大夹子飞来飞去,仿佛一个微型机场。

如今文具店和布店均已消失,街上新开了手工汤团店和茶室,都紧挨着亭前街边的市河,吃汤圆、喝茶的时候,可以欣赏这条老罗店人的“母亲河”。小时候,每逢端午节能在市河边上罗店龙船表演。外婆家客堂间的窗台是最好的观景位,我趴在窗台上,听锣鼓声

一年前,有幸拜识张宝林先生。那是2025年3月31日,报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“夜光杯”读者作者编者座谈会。

座谈会后,我们常在微信上聊天。8月3日,张先生告诉我,他正在写一篇长文《赵超构为什么“少说为佳”》,他说,“这是他给我岳父信中的一句话”。张先生的岳父高集先生,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筹办人之一。张先生将赵信的照片和文章初稿发来,还说,已考证出信写于1985年7月14日。我斗胆提了不同意见,认为应写于6月14日。今年1月21日,张先生发来改定稿,并说“今天把那篇没收尾的稿子找出来,把老兄的意见加了进去”。老先生虚怀若谷,不仅采纳了我的意见,而且还把我提出的理由,写进文章里。

1985年春夏之交,高集“曾亲赴上海,召开座谈会,并登门拜访,动员上海的老朋友们为海外版写稿”。检束勿秋日记,亦有记载:5月7日,“人民日报老记者高集来访,征求对海外版意见”。

文章的标题出处,是赵信的最后一句:“忝为老朽,当然以少说为佳。”赵超构为什么觉得要“少说为佳”呢?张宝林先生是从上下文来分析的。前一句是:“《大好时光忙些啥?》我觉得有许多不必要的‘忙’偏是自己找出来的。”张先生找到了这篇文章,它刊发于赵超构写信前半个月的人民日报头版。他认为对这篇批评形式主义的文章,赵超构“必有深切体察”。这当然是对的。这篇评论一定给赵超构留下深刻印象,他才会信笔引用篇名来生发感慨。但是,究竟为什么要“少说为佳”,张先生的长文并未给出明确答案。文章结尾很妙:“赵超老不想说了。是的,他说了一辈子,不想说了”。让读者自己体会,这是写文章的高明手法。

提一个问题:在战争中最容易失去的是什么?不是弹药与辎重,而是年轻的生命。再提一个问题:世间最容易忘记的是什么?是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



星期日 (纸本水彩) 蒋智南

们,不管他属于作战的哪一方。当我们唱起国歌时,请永远记住我们的“四耳先生”,永远记住我们的聂耳!

分析“他说了一辈子,不想说了”之句,不难体会到,这个“说”,不是指寻常开口说话,而是指发表观点。检索一下,写信的1985年6月,仅仅在“未晚谈”专栏,赵超构就发表了12篇杂文,三天一篇,是相当密集的。可以说,1985年,是赵超构晚年杂文写作的一个高峰期。从这个层面上来看,他并未“少说”。

那么,“少说为佳”是指什么呢?依我浅见,在前面,有一句话,透露了信息:“各报都在‘大换班’”,“新民也不例外”。

新民晚报复刊以后,是“爷爷带孙子”,由一批六七十岁的老报人带着年轻人办报。复刊后的辉煌,这批老报人要记头功。但同时,也带来了领导班子老化的问题。

其实,睿智的老报人,不会看不到这一问题。早在1984年10月18日,束勿秋就在日记里写道:“概括当前报社工作的形势:老的已乏力少精力了,改革、前进也无力了”,“要从青年中发现领导人才”。他用杂文笔法写道:“老是司机,掌握方向盘,青年是马达。”1985年2月14日,老束关照去市委宣传部分会讨论第三梯队建设问题的苏应奎说:“我们准备两年内搞好全部班子。”日记里接着写:“当然是指年龄过大的让青年人。”

看来,新老交替,老束是在作筹划的。但计划赶不上变化。到了6月中旬,上面精神下来了。据老束日记载——

11日,市委宣传部“要在宣传系统年轻化,据说解放、文汇也已安排,今天副部长孙刚又来报社,先听赵超构意见,后又和我谈,主题是老的如何安排”。

12日,市委宣传部“来人谈调查本报情况后的汇报,并提出可考虑入班子的后备人选五人”。

13日,“市委宣传部来人了解情况”,老束提出要“做好老青接班工作,大家满意”。

报社的这些动静,赵超构必定是知晓的。在6月14日写信时,自然而然就提到了“各报都在‘大换班’”,并表示要“少说为佳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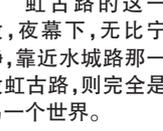
赵束二位,是十分讲大局、讲原则的。市委宣传部也是有工作策略的,晚报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,做了大量的工作,很是平稳,到1986年的夏天,才宣告完成。仍据束勿秋日记:

7月29日,“市委宣传部来电,说晚报班子问题已定,并得到赵超构同意”。这天,老束和张林岚去赵超构家,赵告诉他们“孙刚等三人去他家谈了班子方案,年龄是大关,他也没提什么”,赵超构强调退下来的老报人“要有工作,有事做,不要空起来”。

30日,孙刚“带了两个干部处长来报社谈领导班子的安排问题”,“也强调了一下对老同志要注意安排事”。

据《飞入寻常百姓家:新民报——新民晚报七十年史》载:“1986年8月,副总编辑周珂、冯英子、沈毓刚、张林岚四人同时退居二线,改任评论员。”自此,新民晚报“换班子”大事顺利完成。在这件大事上,赵超构虽然有自己的想法,但是他保留了意见。这样的“少说为佳”,是风度,也是水评。

虹古路的这一段,夜幕下,无比宁静,靠近水城路那一段虹古路,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。



责编:殷健灵

冯与蓝

冯与蓝

冯与蓝

冯与蓝

冯与蓝